政治研究中的比较借鉴问题

王长江 *

摘　要：通过比较、借鉴，吸收和运用来自他人的成果，是优化政治体系运行的有效手段。但是，经常遇到的拒绝主义和照搬主义两种偏向往往妨碍我们进行科学的比较、借鉴，有许多历史教训值得记取。运用政治体系理论，把比较、借鉴放到政治体系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去，特别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现代政治体系的“整体性输入”来思考，有助于我们摆脱偏向，深入探索政治研究中比较、借鉴的规律性。开展比较、借鉴，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方面的任务仍然艰巨。

关键词：比较；借鉴；拒绝主义；照搬主义；政治体系；政治产品；整体性输入

Abstract: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optimize the operation of a political system by comparing, learning, absorbing and using experien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However, the two tendencies of denialism and dogmatism often prevent us from making scientific comparisons and imitations, and there are many historical lessons worth remembering in this regard.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comparing and learning to the entire working process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taking market economy as the “integral input” of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are able to help people get rid of stereotypes and further

*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发展与创新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plore the laws that existed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Deepening learning and comparing in political studies requires to emancipate people's minds and to change their ideas. The task in this regard is still arduous.

Key words: Comparing, Learning, Denialism, Dogmatism,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product, Integral input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比较、借鉴，吸收和运用来自他人的成果，是优化政治体系运行的有效手段，是政治体系走向现代化的捷径。认识国情，探索治国理政规律，都离不开比较。理论上讲，比较有纵向、横向之分。有拿自己历史作参照系的纵向比较，也有拿其他政治体系作参照系的横向比较。相比之下，尽管纵向比较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如何科学地、正确地进行横向比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是本文拟讨论的着眼点。事实上，如何比较、借鉴，我们在实践中总是拿捏得不好，要么简单拒绝，要么全盘照搬的现象屡屡发生。这里面，既有方法论因素，更有理念、观念因素。这些年又出现全盘否定的偏向，说明如何以科学理性态度进行比较、借鉴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亟需反思。

一、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充实和完善自己，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这是最大的后发优势之一。对他人创造的成果和经验简单拒绝或全盘照搬，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所谓简单拒绝，并非一概拒绝、全部拒绝，而是指对外来的东西有强烈的主观排斥倾向，所以亨廷顿用“拒绝主义”这个概念来表示①。我们不妨借用亨廷顿的概念，按其定义方法稍作延伸：全盘照搬也并非绝对照搬，并非完全抛开本国实际，而是有比较浓厚的教条化和忽视国情的倾向，所以可以用“照搬主义”这个

①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4 页。

概念来表示。拒绝主义和照搬主义都妨碍我们对经验教训的吸收，甚至往往使我们错过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方面，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近现代以来，我国历史上至少有两次拒绝主义和两次照搬主义的教训，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次拒绝主义教训出现在乾隆时代。这次拒绝，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要不要向其他文明学习的问题，而只是要不要面对其他文明，即要不要开放的问题。

彼时的西方，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开始加速发展。其中英国更成为西方首屈一指的商业大国和航海大国，有着强烈的向外扩张的冲动。中国则正处乾隆晚期，即世人皆知的“康乾盛世”。经来过中国的一些冒险家、传教士的介绍，当时西方人眼里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大国和强国，辽阔而富饶。至少从表面看，这种说法不算夸张。基辛格曾引用这方面的数字：“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①] 这种状况，使中国对西方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羡慕、向往之情。他们渴望与中国交往，发展贸易。这也正是1793年英国国王要派马戛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来中国的原因。

但是，也正是这种老大帝国的状态，造就了王朝的老大帝国心态。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中就存在一种“中心”情结和“天下一统”的天命：中国是世界秩序的中心，整个世界围绕它运转，受它统辖。用这样一个理念去处理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情况可想而知。难怪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要用“朝贡体系论”来解释明清两代的对外关系理念。在他看来，到明清时期，中国也仍然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天朝，世界上其余国家不论大小，也不管实际上是否向中国朝贡，理论上都是中国的朝贡国。[②]

对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实施统治，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当中的事物，其

---

①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② 参见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①]。国史学家周良霄描述了“中华帝国专制主义”的如下五个特征：大一统、高度集权奴隶式的父权统治、严格控制人民、反对工商业，以及全面的文化暴政。[②] 在追求这种简单一致的观念下，它不愿意看到任何影响秩序变动的因素，希望自己统治下的人民处于隔绝状态，甚至不惜采取海禁政策，限制、禁止臣民与那些未知也不受控制的外人交往。亨廷顿后来有概括：“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③]

清廷入主中华，对统治中华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更加敏感，更加在意，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来见乾隆商谈开放贸易的时候，乾隆是把英国完全当作朝贡国来看待的。他像称呼臣子一样称呼英王，乃至为了显示这种关系，朝臣们索性把英王给乾隆皇帝的信也翻译成俯首称臣的卑微口气。接待使团的朝臣们则不由分说地把马戛尔尼称作“贡使”，把英王委托他带来的礼物标示为“贡品”。

既然要靠单一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那么，在王朝统治者看来，和西方人的交往，最担心的绝不是什么生意上吃亏，而是他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此，乾隆不但对英国人的要求明确拒绝，而且对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严加“防”“堵”。使团沿大运河航行，船只尽量白天航行，晚上靠岸，以减少使团成员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接触；使团偶尔进入民间，要受到跟随官员的严密监视。甚至乾隆还在他给陪同官员下的旨意中，就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等，都看得很紧，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所以，可以想见，马戛尔尼的出使只能乘兴而来，铩羽而归。尽管这次事件离鸦片战争还有 40 多年，但通过这次交往，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改变了，更多看到的不再是它的强盛，而是封闭、衰败和没落。马戛尔尼在返回英国途中总结这次出使对中国的印象：“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55 页。
② 参见王飞凌：《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八旗文化 2018 年版，第 128 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64 页。

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个精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都完了。”[①] 后来的情况，果然不幸被言中。

另一次拒绝主义教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这一次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的和当时的时代因素。

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个排他性的选择。相反，在走向自己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党有过极其灵活的探索，思路非常开阔。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全民族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阐述了“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思想。[②] 他强调，在抗日战争时期内，主要经过国共合作，中国不仅可以建立起它的“民主共和国”，而且在共和国内“全部实行三民主义”。当时毛泽东的认识非常到位：“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③] 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表示，我们“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④]。

在延安，共产党的领袖们还对美国民主制度表达了认同和欣赏。尽管毛泽东往往强调，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欧美式资本主义社会”，但对于欧美的民主显然是接纳的。在他看来，和国民党共建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⑤] 毛泽东在和美国观察员谢伟思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⑥] 他还表示：“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

①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32页。
② 参见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解放》周刊第32期。
③ 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8年7月2日），《解放》周刊第45期。
④ 毛泽东：《团结到底》（1940年7月），《解放》周刊第111期。
⑤ 毛泽东：《中国需要和平建国——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
⑥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转引自约瑟夫·W. 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

府。”[①] 毛泽东甚至谈到，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②]

遗憾的是，随着第三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居间调停转向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也逐渐关闭了。1949 年上半年，在外交政策方面，毛泽东先后用三句话表明了正在筹建的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③] 所谓“一边倒”，就是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一条决定了其他两条：“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把所有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都清除干净，再考虑建交。随着这一立场的明确化，向西方学习的现实条件和可能性也都随之消失。回过头来看，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受当时国际环境、国际格局的影响，自有其道理。只是这样一来，客观上把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大门关上了，只留下一扇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小门。到后来与苏联交恶之后，这扇小门也封闭了。

和两次拒绝主义教训具有同样影响的，还有两次照搬主义教训。

一次照搬主义教训是清末民初对西方政党政治的模仿。

20 世纪初，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松动，西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鼓励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促进了建党潮的兴起。据统计，从 1899 年到辛亥革命前夕，国内公开出现的会、党团体已达 668 个。[④] 清王朝的覆灭，进一步把政治转型问题摆到人们面前。

这一时期的政治转型探索过程，反映出中国人对西方多党制的向往，特别是对两党制的向往。当时的政治派别，大多数都对两党制表示青睐。梁启超极力主张中国的政党制度应效法英、美的两党制。他在 1904 年的《美国政治略评》一文中明确推崇美国的两党制，并以自己的理解把它合理化：“质而论之，则遮党者自由之木铎也，哈党者秩序之保障也。此两义在政治界，

①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1 页。

② 参见《苏联解密档案选：毛泽东著作》，诸夏怀斯社 2017 年电子版，第 10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5 页。

④ 参见王德夫、向勤：《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抉择》，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9 页。

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美国卒以此两者之相竞争，相节制，相调和，遂以成今日之治。而国民对两党之感情，亦随时为转移。”[①] 他在为共和建设讨论会起草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强调，“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②]。康有为也是两党制的拥趸者。他在1912年写了著名的《中华救国论》，其中颇花了一些篇幅，来论证两党制的好处：“夫物惟阴阳，事惟可否，入国会之中，只有赞成与否决，更无中立，然则推国会之天理，只有可否二党而已，其有多党数十，亦不外可否二者，但人心不一，各以地位立党，故有无数之党派出焉。”“要而论之，党少则国安，党多则国危，党尤多则国可亡，若仅两党，则人与天合，国以富强，在朝在野，旗鼓相当。以大党立朝，则党势坚而行政强，以大党在野，则朝党不敢专制而为殃。”故此，“国宜有两政党而不可多政党，宜有大政党而不可多小政党也”[③]。对两党制明确表示欣赏和认同的，还有孙中山。他对两党制的功用进行了论证：“横览全球，无论为民主共和国，为君主立宪国，莫不有政党。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在野党得多数国民之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权，变而为在位党。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④]

然而历史证明，“两党制”只是一厢情愿。实际结果是政党纷争，打得不可开交。章士钊发出感叹，“吾国民智过稚，不适于政党之运行”[⑤]。说到底，还是因为政党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系列条件（不仅仅是皇帝

① 梁启超：《美国政治略评》，见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97页。

② 转引自王德夫、向勤：《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抉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③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见《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3页。

④ 孙中山：《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

⑤ 秋桐：《政见商榷会之片段》，《独立周报》第1年第1期，转引自杨德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退位）具备的基础上逐步演进出来的。例如分权，及分权产生的相互制约；国家与社会的分野；社会分工使多元化阶级基础形成；等等。没有这些，名义上的政党政治，只会蜕变为精英小集团的钩心斗角。倒是戴季陶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比较透彻。他认为："无论何国，凡其政党之成立，必有历史上之原因。若成为对峙不相下之两党，尤必有最深之历史关系。而此种历史关系，必由思想上、社会上、政治上种种方面之原因结果，累积而成。此必然之事也。"①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次照搬主义实验，最初轰轰烈烈，最终则以袁世凯恢复帝制而告失败。

第二次照搬主义教训，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对苏联模式的全面接纳。

"二战"以后，世界分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状态下，其他国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有一个选边站的问题。所谓"一边倒"，就是选择社会主义阵营，明确地向苏联靠拢。这个过程，和前面所说新中国对西方关门相同步，其实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然和苏联站在一起，那就必须拒绝西方。既然苏联被看作社会主义的模板，那么，照搬苏联模式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事实上，苏共也不允许选择别的模式。在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做修改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②。到1962 年，中苏已经决裂之后，毛泽东在一段讲话中谈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中，我们对苏联模式是照搬的。"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③

为了学习苏联模式，中共进行了全党全国范围的动员。1953 年 4 月，中

① 戴季陶：《三党合并观》，见《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58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48 页。

③ 施拉姆：《毛泽东未刊谈话和书信》，第 140—141 页，转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李向前、旷昕、韩钢、张树军等译，冀岱灃校，海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5 页。

共中央发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3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第九至十二章加上“结束语”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涉及苏联模式方方面面的这三章被指定为广大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也成了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主要教材。

这种照搬的强度有多大，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甚至还出现了“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意思是即使学技术，也只学苏联不学其他。1952年11月，总工会就此向中央请示是否需要进行批评、纠正，毛泽东回复道：“‘技术一边倒’的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该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①] 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不难发现，上述拒绝主义和照搬主义经历都发生在我国政治发展朝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和后来我国社会发展出现拐点、遇到曲折，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仅此一点，就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反思。

二、从政治运行规律性上思考比较借鉴问题

比较、借鉴应当从政治的实际运行开始。在这方面，政治体系理论（和“政治系统”概念通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美国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是把“政治体系”概念引入国家、政府分析的第一人。根据伊斯顿的观点，政府、国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被政治环境围绕着的政治系统。政治系统与它的环境进行交换：环境向政治系统输入各种政治要求，而政治系统对这些要求进行处理之后向环境输出自己的产品。后来阿尔蒙德等学者进而用这套方法进行构建，形成了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②] 政治体系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对所有现实存在的国家和政府进行分析、比较提供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7—628页。

② 对政治体系和比较政治学理论的系统论述，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一个理论框架。我们当然应该看到，无论这套理论本身，还是在这套理论的运用过程中，都多多少少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取向，这是我们所不认同的。但是，剔除这些偏颇之处，政治体系理论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研究、分析国家和政府并对之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工具。

从这个视角看，我们这里所说的比较和借鉴，无非是通过对其他政治体系及其运行的分析，总结其经验，发现规律性，避开风险和缺陷，吸收、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以优化本政治体系的运行。和作为学科的比较政治学不同，这里所说的比较、借鉴属于应用研究，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放在推进我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上。

肯通过比较，吸收借鉴他人的政治文明成果，首先是因为好的政治产品往往有足够强的吸引力。政治体系总是要不断向民众提供好的政治产品，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得以维持和发展。所以，一个政治体系的好的产品，往往会引起其他政治体系的学者和政治家的关注。当然，对于好的政治产品，不可能简单拿来就能解决问题。之所以有政治产品产出，是因为有一套能生产该产品的政治体系。而这个政治体系又源自对环境提供的各种政治诉求的回应。从过程上看，一个政治体系的运行首先包括公众政治诉求（阿尔蒙德把它分为“要求”和“支持”两大类）的输入，其次包括政治体系对这些信息的处理，最后包括为回应民众诉求而产生的结果（政治产品）。所以，比较、借鉴既非简单的结果“拿来主义”，也非仅仅照猫画虎地搬用或生硬地拒绝政治体系的某种特定形式，而是对包括政治诉求输入、政治体系形成、政治体系运行和政治产品产出等所有这些环节进行全过程考察和比较，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换句话说，科学意义上的比较、借鉴，就是通过对环境输入、政治体系和政治产品即政治输出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发现政治体系运行的规律性。

为什么在该吸收什么、不该吸收什么，什么能借鉴、什么不能借鉴的问题上总是容易出现片面性，说到底，就是因为对这种互动关系及其逻辑反映出的规律性认识不够。我们可以选取政治诉求输入与政治体系的互动关系为重点，稍微深入地做一些探讨。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对各种政治

诉求的回应。政治体系从无到有，起点是人们的诉求。这些诉求，首先反映的是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正因为此，人的本性，或曰人性，是所有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起点。经济学领域的“经济人假设”，便把人看作是为追求物质利益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社会学领域，则有梅奥和马斯洛等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人假设”。在法学领域，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通过自然法理论把人性和法律联系起来：人类理性或本性是自然法的渊源，而自然法是国家与法律产生的基础。[①] 政治学同样不例外。正如英国史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从柏拉图、边沁到米尔，都对人性有独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为思考政治的基础。”[②] 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即以论证“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③] 开篇，首先建立了这样一套逻辑：人类要延续，于是组成家庭；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坊；若干村坊进而组合成为城市，即城邦；城邦治理，是为政治。《政治学》的全部论述，就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展开。亚里士多德从人性的角度考察人的各种政治行为。例如他讲到变革：“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变革一项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④] 讲到公权人物的产生，亚里士多德对制度设计中人的本性所起作用的描述非常生动：“在我们想来，公职只应选拔贤能，不管谁愿意或不愿意担任这种职位。立法者所以当初订立竞选制度的目的应当是鼓励人们发展各自的抱负，使大家都以服公任官为荣，倘使无所鼓励，有才德的人说不定

① 参见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2 页。
② 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7 页。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7 页。
④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81 页。

谁都不愿意投身于众人的事业。可是，这同时也鼓励了野心（好名）和贪得（嗜利）的性情，这些又不期而把人们引向种种罪恶了。”①

当然，对于人的本性的复杂性应该全面认识。无论是经济人假设，还是社会人假设，都是研究者从某个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即建立理论模型的需要，不能把这些假设等同于实际中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同一个人，担当的角色恰恰是多元的。例如一个男人，在家庭中可以同时是丈夫、父亲、儿子，在社会上则同时是公务员、纳税人、志愿者。分不清理论分析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混淆二者，肯定都有简单化、绝对化之嫌。所以，早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格雷厄姆·沃拉斯就针对当时的研究偏向，特别强调回到对客观人性的关注：“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政治学传统以及一般人的心理习惯所产生的那种‘唯理智论’。”“政治行为和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② 如我们所知，社会学的行动学派所倡导的“社会人假设”，本身就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纠偏。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从人性的复杂性出发，明确地把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修改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也首先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的分析上。马克思承认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部分。我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若干名言，例如，“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③，“‘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④。尽管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对“利益”的理解和解读不断深化，但对利益是人出自本性的需求这一点，马克思是充分认可的。不幸的是，“人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在苏联传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迷失，逐渐离开了原意，乃至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后来甚至进一步极端化了，似乎一谈人性就是“抽象人性”，就是抹煞人的阶级性，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否定人性，相反，他后来的一系列观点，包括人的阶级性问题，都是在分析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90 页。

② 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第 2、4 页。

③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 年 2 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3 页。

既然政治也是建立在人性的起点上，那么由人性出发而产生的政治活动、政治产品就一定有许多可相互借鉴之处。

在这个基本观点上的误识，使我们对许多问题产生了迷误。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权力的认识。我们知道，公权力是一种集合的权力，大于个人权利。这就意味着，利用公权力可以做凭借个人权利做不到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人性的弱点就使公权力有了被滥用的可能。也正鉴于此，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必须对公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点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把国家权力看成是必要的“祸害”，另一方面明确地把工人阶级政权的掌权者限定在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以及领取跟其他工人同样工资的条件上，以防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①] 很遗憾，我们过去不太承认权力的这种共性，总觉得权力会不会腐败要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似乎掌握在先进阶级、先进政党手里的权力就不会腐败。由此产生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按照这套理论建立的政治体系总是屡屡出现权力滥用乃至腐败泛滥的现象。究其原因，无非因为缺乏对权力的足够约束，或者即使有约束，也往往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这是忽视共同人性造成的后果。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人性相通，由人们构建的政治体系却各不相同。如何解释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人的诉求是多元的。在不同的环境下，各种诉求排列不一。不同的偏好，产生不一样的政治体系。例如，把集体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可能会对保姆型强大国家有更多的需求；把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可能为集权制提供更肥沃的支持土壤；当财富的增加成为最普遍、最强烈的追求时，对民主制度的选择或许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和认同；等等。事实上，没有一种政治体系能够同时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实践中建立的不同政体往往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所以，人们往往希望在保留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具备别的政体的优点。这又是人的诉求的普遍性所致。这样一来，更使得为了回应人们的诉求而建立的政治体系相互之间有了可比性。

不同的政治体系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情况下创造出

① 参见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1891 年单行本写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 页。

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色彩。我们有时会被这种色彩所困惑：这些带有不同色彩的成果，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共享？对于一个对自尊心高度敏感的民族而言，别人的“色彩”往往可能是拒绝接受别人创造的成果的重要理由。然而，尽管这些成果必然会打上原创主体的烙印，本质而言，它们仍然是对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普遍诉求的回应，因而是任何政治体系都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只不过一些国家和民族相比另外一些国家和民族更早正视了这些问题，更早做出了应对而已。因为“色彩”而拒绝对这些成果的吸收和借鉴，显然是不明智的。

不过，在比较借鉴中完全忽视“色彩”问题，又确实可能为照搬主义偏向所误导。如前所述，我们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教训。要把握好这一点，有必要对政治产品的生产过程做进一步的分析。

处在政治体系输入端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两种情况。一是那些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关联的各种类型的要求。这些要求稍经整合，就可以直接输入到政治体系中。例如工人希望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希望保护农产品价格，商人希望降低交易税等，都属于这类要求。二是已经积淀成文化的要求。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随着经验的积累，特定疆域内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比较稳定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共同信仰，即文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如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华夏文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等，都是由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创造的不同文明和文化。在不同文明积淀的背景下，人们的诉求往往不是直接输入政治体系，而是首先和特定的文化相结合，再作为整体，输入政治体系。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输入，政治体系会有不一样的回应，也往往会生产出不一样的政治产品。前一种产品基于人们的物质需求，体现更多的共同价值，因而体现到政治体系上也大同小异，甚至在比较中可以直接采取“拿来主义”。譬如，不管何种政治体系中的人，都希望国家能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相应地，国家就必须设立警察机构，制定财产保护法律，惩罚盗窃、抢劫等犯罪活动。这方面的学习和借鉴，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相比前者，形成为文化的输入则是一种整体性输入，会使人们对外来事物的选择大相径庭。如果它和原政治体系中已经

包含的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不同文化之间固然也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照搬照抄，不但往往流于形式，造成食而不化，甚至会出现强烈的“排异”反应，导致治理失败和动乱。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冲突”，这种情况就占了相当部分。在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我们既能看到大量生吞活剥搬用西方模式失败的照搬主义例子，也能看到因为这种失败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拒绝主义典型。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试着对如何比较、借鉴的问题做一个概括。所谓不要简单拒绝和不要盲目照搬，都不是说可以主观任意地对别人的政治产品进行分解、取舍。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性，才是它的确切含义。避免拒绝主义，就是不但对其他政治体系的成果认真比较、大胆借鉴，而且对明显带着原创者色彩的成果保持开放心态，深入研究，理性对待；防止照搬主义，就要在分清什么是出自人类天性创造出来的、可以共享的经验，什么是在特定文化下才有的成果的前提下，把他国的政治文明成果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在一起。

三、深化对市场经济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认识

当我们把文化当作“整体性输入”来看待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诉求一旦成了整体性的，便有了特定的场景和自己的内在逻辑，很难拿来借鉴，否则有照搬主义之嫌。就文化而言，的确如此。已经积淀为文化的东西确实很难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但是，文化具有整体性，并不意味着有整体性的只能是文化。政治环境里，除了文化，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同样可能具有整体性，却同时又是可以借鉴的。例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任何政治体系对于违法犯罪行为都会实施惩罚。但是，如果比较轻微的违法犯罪也动辄送进监狱，往往既难以收到良好效果，也加重了制度负担。为回应这一需求，在美国率先发展出了社区矫正制度。这套制度行之有效，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完善、比较成型的制度，各个国家，包括我国，都在学习和引进。对其他国家来讲，借鉴、接受美国发明的社区矫正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诉求的整体性输入。

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市场经济是最重要的整体性输入。这应该成为我们思考许多问题的前提，也应该是我们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

市场经济不是指一种具体做法，也不仅是指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市场这种场景，而是有着自身逻辑的一套制度。市场经济的起点是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这就首先要求尊重人的独立性，支持个性解放，保障个人权利；人们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于是有了市场；在市场上交换必须遵守大家认可的规则，于是又有了契约，所以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而且市场经济是复合的制度：一旦投入运行，会带动一系列相配套制度的建立，如私有产权制度、信用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所有这些，都是构成市场经济整体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

同样，市场经济也必然对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要求。第一，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就必须制定相应的宪法法律，保障人及其利益的独立性、自主性。第二，人的需求是多元的，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自然会延伸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使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成为基本价值。第三，既然政府的存在本质上是维护和发展人们利益的需要，人们必然要求参与到政府过程中去。这种政治参与，既包括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也包括对政府构建过程的参与。第四，属于多数人的权力，只有委托给少数人才能有效运行，这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如选举。第五，为了防止公权力侵犯个人权利，需要对权力进行约束，分权、制衡、监督等由此产生。民主政治就是人们回应市场经济要求而形成的最大共识，民主制度就是反映市场经济这些政治诉求的基本制度安排。接受市场经济，就不能不接受民主政治，不能不接受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的种种要求。已经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也不例外。这正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基本价值的原因所在。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也并非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性制度来看待。按照邓小平的观点，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束缚人的积极性，使得我们国家发展不起来。改革就是为了打破这种状况。因此邓小平把改革的起点放在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要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必须承认人对利益的正当追求。所以，邓小平是从常识出发来设置改革议题的。当然，如前所述，有利益就有交换，有交换就有市场，有市场就会带出承认不承认市场经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的思想和理念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的过程。最初，我们采纳了“商品经济”的提法来代替“市场经济”，强调我们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应地还陆续出现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等提法。直到党的十四大，才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党章和党的正式文件。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是邓小平对市场概念的解读。1979 年 11 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回答他们的一些提问。吉布尼当然秉持的是西方主流观念，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套制度，并且把它和资本主义划等号。所以他很谨慎地问邓小平：“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断然回答，“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 到后来他更加明确地强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

邓小平关于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的论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就实践意义而言，把市场作为手段是一种很有智慧的判断。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际社会，市场经济都总是被人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状态下，“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往往和“走什么道路”被混为一谈，似乎只要主张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计划经济，拒绝市场经济。陷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泥潭中，改革开放事业就很难

①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 年 11 月 26 日）》，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6 页。

②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 年 1 月 28 日—2 月 18 日）》，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7、373 页。

向前推进。邓小平把市场摆在手段的位置，强调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一下子就冲破了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羁绊，其深远影响，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就理论意义而言，虽然把市场经济定位在“手段”上，却没有因此堵死对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理解和探索的空间。“手段”的说法确实很难让人把它和制度、系统性、体系性等概念联系起来，也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整体性缺乏关联。应该说，这客观反映了我们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水平。但是，邓小平还是看到了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深层关系。譬如，我们刚才讲到，邓小平改革的出发点是“调动积极性”。他同时又讲到，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①。这就是一个比“手段”要深刻得多的问题了。到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于调动积极性、搞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的紧密联系，他看得更加透彻：“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② 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眼里也正在从一种具体手段逐步变成一个和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复杂系统。其实，邓小平的伟大，不在于他一开始就预见到市场经济的伟力，也不在于他预先就能设定目标，而在于当市场经济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全面要求和全面推动展现出来的时候，他能因应时代要求，顺应时代潮流，不因循守旧，及时推进改革。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方法论财富和思想遗产。

还不能说，现在我们对这笔财富已经掌握和运用得很好了。尽管相比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深刻了许多，甚至对市场经济在作为一种制度运行时内部诸因素之间如何有机互动、如何形成合力有透彻的了解，但对它作为政治环境和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因素输入政治体系时怎样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与政治体系互动，则认识不深，有时有意回避。结果是，在比较、借鉴中对它的取舍依然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对其中愿意接受的，很快就接受下来；对不愿意接受的，则往往以“不合国情”为由拒

①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 年 4 月—5 月）》，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3 页。

②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年 6 月 12 日）》，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2 页。

之门外。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把市场经济当作了一顿丰富的自助餐，看上去花样繁多，真正用起来，却无非是从中选一些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大快朵颐，不合口味的则完全忽略。这显然是对市场经济作为制度整体性输入现代民主政治这个特点认识不清的缘故。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整体性输入，市场经济给政治体系带来的不可能全是好处。消极的方面也会相伴而来。它既会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动力，促进政治体系的完善和优化，也会给政治体系制造麻烦，带来挑战和风险。譬如，人的个性的解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它也必然促动人们起来挑战政府的权威；民主参与的热情会促进政府走向善治，同时这种热情可能激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不稳定；市场经济自然倾向于全球化，同时全球化又会给国家主权带来新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它会带来新情况、新问题就拒绝市场经济，也不能想当然地把市场经济一劈两半，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留下好的，扔掉坏的。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对它带来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探索，把握其规律性，充分利用其优点，努力把缺陷和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实现政治体系的最优化。

解构性地对待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政治体系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一些消极的后果，甚至可能把经济政治发展带离健康的方向。例如，一方面强调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却不顾干预的有限性而过度介入，甚至以为这就是我们应当保持的独特优势。这很可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发挥，而且很可能使政府从市场管理者蜕变成市场主体之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摧毁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又如，一方面调动人的积极性，把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归还给人们；另一方面对过去体制中限制人们政治参与的各种规则予以保留。这很可能使体制内有序参与的途径不畅乃至发生堵塞，实际上起了使诉求溢出体制之外另寻途径的作用，结果反倒会大大削弱体制的权威。再如，一方面承认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却总想用行政手段来约束这种多元化，行政权力从上到下一统到底。这很可能扭曲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妨碍社会的正常发育，使社会板结、缺乏弹性，整个体制失去活力。上述可能性有的正在变成现实，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四、比较借鉴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

在当今全球化环境下，比较、借鉴已经成为各国改革中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和几百年前比，还是和几十年前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已经更加科学，更加务实，更加理性。但是，上述分析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地进行比较、借鉴，最重要的依然是防止拒绝主义和照搬主义的偏向。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观念或理念的问题。无论是拒绝主义偏向，还是照搬主义偏向，都首先是观念的偏差。从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今天的现实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仍然需要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且任务艰巨。

有哪些需要转变的理念仍然影响着我们？在我看来，主要有三。

一是民族主义思潮。

人是社会动物，都生活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中，自然会有民族归属感。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微观而言是道德的基础，宏观而言是爱国的基础，不容否定。但民族情结一旦变成民族主义，就有了排他性，多半是负面的、危险的。前面我们举了晚年乾隆的例子。不能说乾隆时代所有人都没有看到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技方面正在落伍。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贡品”中，包括了清朝人从未见过的天体运行仪、射程达千米的臼炮、自来火枪等。然而，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让当时仍自认“中心”的天朝承认自己落后，这关乎民族的自尊和天朝的面子。如我们所知，随后这些技术都被作为不值一提的“奇技淫巧”搁置不理。后来在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被世界潮流边缘化的状态下，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经挫折、屈辱和磨难，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则在此过程中被不断强化着，至今对我们仍有影响。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各种矛盾相互激荡，使得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不单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民族主义也波涛汹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有时民族主义暗流的涌动和裹挟还相当明显。和民族主义有关的拒绝主义倾向不但对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有百害而无一利，还会有意无意地影响我们的研究，对此应有足够的警惕。

二是意识形态禁锢。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做指导，历来是我们党的一个巨大优势。这是被 90 多年的历史发展证明了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接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受苏共影响很深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苏联人加工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是容易封闭、僵化。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打破这种封闭、僵化，把马克思主义切实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后来改革的不断深化，也是通过不断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束缚来实现的。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僵化、教条化是一个痼疾，解放思想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任务。

意识形态僵化、教条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苏联理论教给我们的是简单两分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即邓小平所说，动辄就问姓社姓资。其实，和进行政治革命不同，在进行国家建设的情况下，许多决策要求的都是最优化选择，并无是非对错之分。不能说主张 8% 的发展速度是对的，主张 7% 就肯定是错的；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主张轻工业带动其他各业就肯定反动了。政治领域同样如此。

在比较、借鉴问题上，我们仍能时常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子。一顶意识形态的帽子，足以捆住我们的手脚，把大量可以探索的问题，乃至一个领域，都划入禁区。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摆脱动辄问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窠臼，才能让思想始终保持开放的状态。

三是既得利益的藩篱。

一个政治体系运行不科学，原因之一往往是权力配置不科学。从这个角度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变不合理不科学的权力格局。而且，我们知道，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权力格局，特点是权力无限，事无巨细包揽一切。针对此进行的改革，本质上是一个从无限权力走向有限权力、从权力不受约束走向受到越来越多约束的过程，形象的说法叫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不难发现，解决这个问题，要比最初配置权力时难度大得多。道理在于，权力和利益相联系。不合理的权力配置，会形成不合理的利益分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会沉淀下来，固化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既得利益格局。改革不但要改变权力配置，而且要动既得权力的奶酪，这就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挠。长期沉淀下来的既得利益本身会化作政治诉求，影响改革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才被看作是一场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来进行的自我革命。

既得利益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比较、借鉴中自然也会体现出来。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些没有深奥理论、在许多国家屡试不爽的改革举措，却久久不能拿来为我们所用。原因何在？不是因为与我国国情不合，而是因为它们会损害既得利益。在这里，既得利益的权衡实际上成了该不该学习借鉴的取舍标准，足见其影响之深。

所以，比较、借鉴也需要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真正站在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思考问题。